

# 台湾政党再次轮替的深层原因

林 冈，储俊庚

(上海交通大学 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 200240)

**摘 要：**台湾在 2008 年出现第二次政党轮替的深层原因是民进党未能解决政治贪腐和经济衰退这两项选民最关心的议题。2005 年“三合一”地方选举是民进党“由盛转衰”的分水岭。2008 年 1 月的“立法院”选举，初次采取以小区单席为主、政党比例代表为辅的制度，放大了国民党和民进党的得票悬殊，在“立法院”形成“一大一小”的席次格局，为台湾政党的再次轮替埋下了重要伏笔。在 2008 年最高领导人选举中，民进党候选人既无法有效整合内部的派系结构，也无法摆脱扁案和激进“台独”路线的困扰，争取中间选民的支持，从而导致了台湾政党的再次轮替。

**关键词：**台湾政治；选举制度；单席选区制；民进党

**中图分类号：**D67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 - 1590(2010)01 - 0059 - 08

2008 年台湾出现的第二次政党轮替，意味着台湾选举政治的进一步成熟。从规范的意义上说，政党再次轮替乃是测量民主化巩固程度的关键指标。<sup>[1]</sup>从经验层面分析，在野八年的国民党得以“班师回朝”，民进党遭到选民的唾弃，根本原因在于当年侥幸取胜的民进党当局缺乏理政能力，执意谋求台湾“法理独立”，罔顾经济发展和政治清廉这两个台湾人民普遍关心的议题。如果说，国民党在 2000 年的下野，主要是因为“黑金”政治的腐蚀的话，那么，民进党在 2008 年选举中两次败北，则是因为其在“拼经济”和“反贪腐”这两个议题上都交了白卷。这也说明民生议题已经成为台湾选民最为关心的问题，选民的投票行为基本趋于务实、理性，摆脱了省籍情结和民进党刻意打造的“统独之争”或“台湾认同”等议题的纠葛。

本文分析民进党执政八年的历程，探讨台湾政党再次轮替的深层原因。全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选民投票行为探讨民进党遭到失败的必然逻辑；第二部分探讨民进党“由盛而衰”的制度性原因；第三部分从民进党派系共治的内在矛盾阐述台湾政党再次轮替的根源。最后总结全文，并对台湾政党政治的未来发展方向作一些推论。

**作者简介：**林 冈，男，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储俊庚，男，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生。

## 选民的回顾性投票

民进党在 2000 年取得执政权，在 2001 年的“立法院”选举中一跃成为第一大党，与国民党的分裂和亲民党对国民党传统票源的蚕食有关，但更深层的原因是民众对李登辉主政后期“黑金”政治的极度反感，因而寄希望于民进党或独立候选人宋楚瑜，结束贪腐政治。2000 年选举中，国民党候选人的得票率（23.1%）远远低于其他两组候选人（分别为 39.3% 和 36.8%），原因就在于国民党政治贪腐的劣绩，抵消了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政绩，使其在社会上的形象严重受损。民进党在 2000 年执政后台湾经济明显下滑，仍然可以在 2001 年“立法院”选举中成为第一大党，原因也是部分选民当时仍寄望于民进党实现“清廉勤政”的政治目标。此外，当年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在年龄（50 岁）方面比国民党候选人连战（64 岁）和宋楚瑜（58 岁）占有优势，在台湾民众求变心切的时期，较易吸收年轻人的选票。然而，民进党执政之初的清廉形象，在八年后恰恰为贪腐所取代；民进党候选人的年龄优势在国民党完成世代交替后也不复存在。

民进党执政后，未能善加利用行政优势，争取中间选民的支持，反而执迷于操弄统“独”这一高敏感性议题，罔顾经济低迷和贪腐政治的蔓延，很快打破了其“勤政、清廉、爱乡土”的招牌。2005 年高捷弊案的爆发和年底“三合一”（县市长、县市议员、乡镇长）选举，可以视为民进党“盛极而衰”和陈水扁开始“跛脚”的重要分水岭。在此次选举中，民进党惨败，其执政县市由 10 个降到 6 个（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台南县、高雄县和屏东县），限定在浊水溪以南的一小块地盘，以国民党为代表的“泛蓝”阵营则掌握了 15 个县市的执政权，明显领先。

作为民进党“由盛而衰”的转折点，2005 年的“三合一”选举，具有回顾型投票（retrospective voting）的明显特点。回顾性投票指的是选民依照执政党的施政成绩来决定投票行为。<sup>[2]</sup>就解释选民个体投票行为的研究途径来说，“回顾型投票”属于理性选择理论，强调经济议题对选民投票行为的影响。<sup>[3]</sup>回顾性投票意味着选民对政治领导具有事后追究的能力。2005 年选举结果，就反映了民众对民进党既无力理政而又弊案频生的不耐，希望通过再次政党轮替解决“黑金”问题。在高捷弊案的阴影下，陈水扁极力辅选的台北县长候选人罗文嘉败于代表国民党参选、得到马英九大力支持周锡玮，说明了台北县选民对陈水扁的唾弃。与民进党在选举中遭到重挫相映衬的是，陈水扁的声望下跌到上任以来的新低。根据《联合报》在 2005 年选后调查，只有 21% 的受访民众给予陈水扁好评，不满意比率则攀升到 62%。与此相反，有 68% 的民众支持马英九代表国民党角逐 2008 年的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大位，有 63% 的选民甚至还表示，期待下届“总统”人选换个政党做，只有 13% 的人希望民进党继续执政。在此后的选举中民进党继续失分，欲振乏术。在 2006 年北、高两市的市长选举中，民进党虽然在高雄勉强胜出，但在台北却大幅落后于国民党候选人。台湾选民的回顾性投票行为，在 2008 年的最高领导人选举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根据台湾 TVBS 在 2007 年 9 月公布的民意调查，与 1999 年前同一时期所做的民调作比较，被问到是否支持“‘总统’换党做做看”的问题时，支持“换党做做看”的台湾民众由当年的 51% 大幅上升为 66%。<sup>[4]</sup>《天下杂志》2008 年 1 月在所发表的民意调查报告则显示，对台湾经济现状表示不满意的受访民众高达 72.4%；认为贫富差距严重的受访者高达 85.2%，不满意台湾目前整体生活环境质量的民众超过了 50%。<sup>[5]</sup>这两项调查集中反映了台湾选民对民进党执政无方的强烈不满。

民进党在 2008 年 1 月选举遭到惨败后，希望在 3 月份的最高领导人选举中出现“钟摆效应”，产生“逆转胜”的结果。钟摆效应的理论依据是选民出于对执政党不满，将选票投给反对党，而导致选举结果的变化。但正如台湾学者吴玉山所指出的，1 月份选举刚过，就期望 3 月份出现“钟摆效应”，在逻辑上难以成立，因为选民根本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经过观察、反思而改变投票行为。<sup>[6]</sup>其实，“逆转胜”也好，“钟摆效应”也好，只是处于颓势、面临下台的民进党的一厢情愿。2008 年 3 月大选前，台北有关“钟摆效应”抑或“西瓜效应”的讨论，所围绕的核心问题是台湾选民是否可能像美国一些选民那样，有意采取“分裂投票”（split ticket voting）行为，使“行政系统”和“议会系统”互相牵制。国民党强调“立法系统”和“行政系统”应该属于同一个政党，才能避免出现政治僵局和乱象，希望选民不要采取分裂投票的行为。民进党则以防止出现“西瓜偎大边”，亦即国民党“一党独大”现象，为竞选主轴之一。可见，如果两场选举在同一时间举行，根本不会出现“钟摆效应”这一似是而非的假议题。而台湾选民之所以没有进行“分裂投票”，也是基于对民进党执政时期政治乱象的反思，而寄希望于国民党全面主政，落实责任政治。

## 民进党“由盛而衰”的制度性原因

民进党在其权力的鼎盛期，与国民党在 2004 年夏天联手通过“立法委员”减半，实行并立式的单席选区两票制的改革方案，对其日后的发展预设了不利的制度条件，为 2008 年政党再次轮替埋下了重要的伏笔。<sup>[7]</sup>在 2004 年最高领导人选举中，陈水扁因为选前枪击事件侥幸当选，其得票率从 2000 年 39.3% 猛增到 50.11%，盛极一时，当年的民进党颇有长年执政的态势，不少海内外的学者专家也预料民进党为代表的“泛绿”势力可望在 2004 年的“立法院”选举中获得过半席位。<sup>[8]</sup>在这一对“绿营”有利的政治氛围中，民进党的一些策士未曾料到“泛蓝”在 2005 年后迅速整合的趋势，高估了自身开拓中间票源的能力，在 2004 年夏天推动“立法院”选举制度改革时，与国民党联手通过并立式的单席选区两票制的改革方案。根据这一方案，“立法院”选举以小区单席制为主、政党比例代表制为辅的“修宪”共识，双方决定第 7 届“立委”的任期由三年改为四年，从 2008 年开始实行。在 113 席“立委”中，“区域立委”73 名，一区一席；原住民的保障名额 6 名，分平地 and 山地原住民，各选 3 人，维持复数席位制；“不分区立委”34 人，由政党比例代表制产生；“区域立委”只要获得简单多数即可当选。这一新的制度对小党明显不利，政党比例代表制的名额（34 席）不到“区域立委”（73 席）的一半；大党根据政党票得票率，分配“不分区立委”的席位，不受“区域立委”当选数目的影响，所实行的是并立式而非联立式的两票制。<sup>[9]</sup>

1992—2004 年，台湾“立法院”选举都是采取单一不可让渡投票和一区多席制（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and multimember district electoral system）。这一制度为走极端路线的小党提供了生存的空间，不利于两党制的形成，同时助长同党内部的恶性竞争。台湾第一次政党轮替后，“行政院”和“立法院”严重对立和“立法院”内乱象丛生，导致民间对“立法院”的极度反感和要求“立委”减半的强烈呼声，迫使一些“立委”候选人在 2001 年“立法院”选举前表态，一旦当选，将支持“立法院”通过“立委”减半的“宪法”修正案。<sup>[10]</sup>民进党前主席林义雄力主“立委”减半，也对民进党的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对于选举制度的改革后果，民进党内有不同的评估。柯建铭等人秉承陈水扁、林义雄的意图，主张实行单席选区两票制。“新潮流系”人士则认为，在新的选

举制度下民进党只能获得 113 席中的 35 到 40 席，顶多 45 席，将明显处于不利地位。林浊水因为反对选制改革，还险些被陈水扁开除出党。<sup>[11]</sup>新制理论上对国民党和民进党两大政党都有利，但其前提是两党得票率相近，否则在“区域立委”的席位分配上，就会产生“赢者全赢”的现象，放大两党的得票差距。事后的发展表明，新制的实施对民进党明显不利，民进党所获“立法院”的席位（27 席），甚至比原先最为悲观的估计还要少。不管是所获席位，还是席次率，均创下 1992 年“立委”全面改选以来的最低记录（见表 1），预示着其在最高领导人选举中的全面溃败已经无法避免。

表 1 台湾主要政党在“立法院”选举的得票率、席位及席次率

	1992年	1995年	1998年	2001年	2004年	2008年*
国民党	52.7% 94席 58.4%	46.1% 85席 51.8%	46.4% 124席 55.1%	28.6% 68席 30.2%	32.8% 79席 35.1%	53.50% 81席 71.7%
亲民党	尚未成立	尚未成立	尚未成立	18.6% 46席 20.4%	13.9% 34席 15.1%	0.29% 1席 0.9%
新党	尚未成立	13.0% 21席 12.8%	7.1% 11席 4.89%	2.6% 1席 0.4%	0.1% 1席 0.4%	无候选人参选 “区域立委”
民进党	31.4% 51席 31.7%	33.2% 54席 32.9%	29.6% 70席 31.1%	33.4% 87席 38.7%	35.7% 89席 39.6%	38.17% 27席 23.9%
台联党	尚未成立	尚未成立	尚未成立	7.8% 13席 5.8%	7.8% 12席 5.3%	0.96% 0席 0
其它*	15.9% 16席 9.9%	7.8% 4席 2.4%	16.9% 20席 8.9%	9% 10席 4.4%	9.7% 10席 4.4%	7.08% 4席 3.53%
总计	161席	164席	225席	225席	225席	113席

\* 其它包括未列出来的小党或无党籍人士。

\*\* 2008年的得票率指的是国民党、民进党等在区域和原住民“立委”选举得票率，而不是政党票的得票率，后者分别为 51.23%和 36.91%。

资料来源：台湾“中央”选举委员会。1992年的数据引自 Steve Tsang & Hung-mao Tien, eds, *Democratization in Taiwa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91。其它数据源自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分年度表列的数据 (<http://vote.nccu.edu.tw/cec/cehead.asp>)。表 1 系作者根据历年数字整理编辑，并根据原住民“代表”的得票率，对选举研究中心列的 2008 年数据作了修正。

由表 1 可见，在 2001 年的“立法院”选举中，民进党的得票率较 1998 年增加了近 4 个百分点，与 1995 年相差无几。但由于国民党的分裂，民进党作为第一大党，在一区多席的选举中，凭借 33% 的得票率和较好的配票策略，获取了将近 39% 的席次。同时，新成立的台联党凭借 7.8% 的得票率，获得 5.8% 的席次，扩大了“泛绿”的地盘。在 2004 年的“立法院”选举中，民进党在得票率和席次率上略有增加，但未能实现“泛绿”取得“立法院”过半席位的既定目标。在 2008 年的“立法院”选举中，民进党在区域“立委”选举中，无法如愿地吸纳台联党的票源，虽然获得了 38.17% 的总得票率，较 2004 年增加了 2 个多百分点，但只获得 73 个席位中的 13 个席位，不到 18%；同时以 36.9% 的政党得票率，分配到 34 席不分区“立委”中的 14 个席位，共 27 席。与

此相反，国民党成功地整合了亲民党和新党的票源，凭借 53.5%的区域“立委”得票率和 51.2%的政党得票率，囊括了“立法院”的 81 个席位，所获席位是民进党的 3 倍。同时，亲民党不参加不分区选举，新党和台联党的政党票得票率分别为 3.95%和 3.53%，因未过政党票的 5%门槛而未分配到席位。假设台湾采取的是联立式两票制，国民党依照 51.2%的政党得票率就只能获得 58 个席位，由于在 73 个“区域立委”中国国民党已经获得 57 席（另外 3 席“区域立委”为无党籍人士所得），便只能分配到 1 席“不分区立委”名额，外加 4 个原住民席位（另外两个原住民席位为亲民党和无党籍人士所得），总席位就将是 62 席而非 81 席；但民进党却可以根据 36.9%的政党得票率，获得 42 个席位，扣除已经获得的 13 席“区域立委”，尚可分到 34 席“不分区立委”中的 29 个席位（另外 4 席“不分区立委”名额作废），比目前选制下所能得到的多 15 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民进党在 2004 年与国民党联手通过以小区单席制为主、政党比例代表制为辅的并立式两票制的选举改革方案，目的是为了占亲民党、台联党、新党等小党的便宜，没想到民进党的得票率明显落后于国民党，反而吃了大亏，若不是当年民进党过高估计自己的票源，是不会如此挫败的，结果只能以“愿赌服输”来自我解嘲。

## 民进党权力斗争的负面影响

民进党内派系林立，向有“派系共治”或“派系联盟”的传统。在其建党初期，主要有“美丽岛”和“新潮流”两大派系。<sup>[12]</sup>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从上述两大派系中又分离出“正义连线”（1990 年）和“福利国连线”（1992 年），加上由海外返台的“台独联盟”，形成五大派系并存的局面。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随着许信良退出民进党和黄信介逝世，“美丽岛系”开始没落，其成员大多转入张俊宏领导的“新世纪办公室”和许荣淑领导的“新动力办公室”。民进党执政后，“新潮流系”、“正义连线”、“福利国连线”和“台独联盟”的一些要员，如邱义仁、游锡堃、张俊雄、苏贞昌、谢长廷、陈唐山等，纷纷进入行政系统担任要职，原来的派系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从陈水扁第二任期开始，特别是高捷弊案曝光后，民进党内的“四大天王”吕秀莲、苏贞昌、游锡堃和谢长廷开始争夺未来大位的“卡位”之争，而有所谓谢系、游系、苏系的说法，并出现了“新苏联”（由“新潮流系”、“苏系”和“绿色友谊连线”构成）和“主流联盟”（由“正义连线”、“福利国连线”、“新动力办公室”和“台独联盟”构成）相抗衡的局面。事实上，民进党内部的派系构成以及各派系或政治人物的合纵连横，乃是利益交换的策略性联盟，在政策诉求上没有根本区别。除了“新潮流系”外，其它派系的组织凝聚力都比较弱。2006 年 7 月民进党第十二次“全会”决定解散派系后，民进党内的派系活动虽然受到一定制约，但并没有停止暗斗。前“新潮流系”还在两年后成立了“财团法人台湾新社会智库”，作为凝聚原派系成员的组织平台。

民进党内的权力斗争，在其执政的最后两年期间进一步公开化。2006 年秋扁家弊案曝光、吴淑珍遭到起诉后，时任“行政院长”的苏贞昌通过媒体放话的方式，公开表示如果他的家庭发生类似弊案，他就将毅然辞职。谢长廷则私下劝陈水扁找个适当时机下台，表示“总统下台，也不是大不了的事”，对陈水扁施加“逼宫”的压力；谢在年底的台北市长选举中，还有意与陈水扁切割，凸显了民进党“律师世代”的分裂。<sup>[13]</sup> 吕秀莲也与陈水扁保持距离，以“蓝天绿地”联盟为口号，透露出其与李登辉、王金平结盟，提前承接大位的心路。唯有党主席游锡堃，以“正绿”的代表者自

居，全力支持为家庭弊案所困的陈水扁，游走于扁、苏之间，安抚苏贞昌，将其与陈水扁的政治前途捆绑在一起，缓解“逼宫”压力，同时坚持民进党反“罢免”、反“倒阁”、反重组“内阁”的立场，防止“蓝营”通过取得一些民进党籍“立法委员”的支持，通过“罢免”案。<sup>[14]</sup>为转移民众对扁案的视线，游锡堃推行激进的“台独”路线，实行“排蓝民调”，排除中间或“偏蓝”的选民参加民进党在党内提名前所进行的民调，从而使一些较有民意基础的民进党人士在党内初选中淘汰出局；并企图在2007年5月民进党决定“总统”候选人之前，提出“宪改”草案，将“宪改”往“新国家、新认同”的方向推进，攫取个人利益。<sup>[15]</sup>民进党内“四大天王”争夺“总统候选人”斗争，以谢长廷胜出而告终，其主要原因是前“新潮流系”支持苏贞昌，而遭到党内其它派系的联合反弹，致使苏贞昌在党内民调落败于谢长廷。党内各派系合纵连横的最终结果是出现“谢苏配”这一貌合神离的竞选团队，反映了陈水扁因弊案所困政治操控力的下降。虽然陈水扁在其任内没有预先指定“总统候选人”的人选，但从陈与“四大天王”的关系来看，其较属意的人选可能是苏贞昌或游锡堃。如陈水扁在2009年初写给苏贞昌的信中，说明2004年未能进行“扁昌配”的原因，是遭到吕秀莲和谢长廷的联合抵制；认为苏在2006年初出任“行政院长”，为竞逐2008年的大位提供了“晋阶”。而在同时写给游锡堃的信中，坦承两人的“关系最紧密”；在写给自己的信中，又后悔没有让游锡堃一直担任“行政院长”到2008年5月，如此就没有“谢苏之争”，只剩下游锡堃搭配吕秀莲“代表民进党竞逐2008年的总统”，“不至于只拿到41%的选票”。<sup>[16]</sup>在陈水扁任内，台湾主要党政领导人频繁更替职位，游锡堃先后担任“行政院长”3年，“总统府秘书长”1年5个月，党主席1年8个月，任职时间最长；苏贞昌先后担任“总统府”秘书长9个月，党主席1年，“行政院长”1年4个月，资历完整；谢长廷则担任党主席2年2个月，“行政院长”不到1年，从未出任“总统府秘书长”这一职务，多少反映了扁、谢的心结（见表2）。而陈水扁在2008年选举中，未给谢长廷提供竞选经费，更说明了“长扁之争”的客观存在。

表2 陈水扁执政时期台湾主要党政领导职位的频繁更替

党主席	任职时间	“总统府”秘书长	任职时间	“行政院长”	任职时间
谢长廷	2000.5	张俊雄	2000.5	唐飞	2000.5
		游锡堃	2000.7	张俊雄	2000.10
陈水扁	2002.7	陈师孟	2002.1	游锡堃	2002.2
		邱义仁	2003.2		
		苏贞昌	2004.5		
苏贞昌	2005.1	游锡堃	2005.2	谢长廷	2005.2
游锡堃	2006.1	陈唐山	2006.1	苏贞昌	2006.1
陈水扁	2007.9	邱义仁	2007.2	张俊雄	2007.5
		叶菊兰	2007.8		
谢长廷	2008.1	陈唐山	2008.3		

由于民进党内部的权力斗争，谢长廷在2008年大选前，迟迟未能完成内部整合过程，就是在谋求党内团结的“2·28逆风行走”后，党内也未完全解决团结的问题。陈水扁原本想全程参加逆风行走，结果才走了2个小时就被党内人士劝退，担心其成为“票房毒药”。这种情况跟民进党在2000年和2004年的经验完全不同。2000年大选期间，民进党提前3个月即完成了内部整合；2004

年大选时民进党则是提前 4 个月排除了在最高领导人副手人选问题上的变数。然而，2008 年前民进党内围绕最高领导人候选人的权力斗争，留下的派别斗争的裂痕，却迟迟未得到弥合，加上谢长廷的身体状况和选举经费的限制，影响了选前的造势力度。正如一位台湾学者在选前所观察的，谢长廷在 2008 年的选举目标只是争取小输，故在选战中置中间选民于不顾，主打“入联公投”、“反对一中市场”等基本教义牌。<sup>[17]</sup>可见，台湾在 2008 年再次出现政党轮替，是有其客观必然性的。

## 结 论

台湾在 2008 年出现的第二次政党轮替，反映了台湾民主政治的渐趋成熟。观察民进党执政八年“由盛而衰”的过程，其主要原因在于未能解决政治贪腐和经济衰退这两个选民最关心的问题。陈水扁在 2000 年以“绿色执政，品质保证”为口号，以“拱宋打连”为谋略，侥幸当选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但民进党执政基础薄弱，能力不足，结果是岛内“黑金”政治愈演愈烈，经济竞争力不断下降。对此，台湾人民用选票作了新的选择。2005 年“三合一”也就成为民进党“由盛而衰”的分水岭。这次选举，带有明显的回顾型投票的特点，即选民依照民进党的施政成绩来决定投票选择。2008 年的两次选举，同样体现了回顾型投票的鲜明特点。这些选举都反映了中间选民对民进党的唾弃。从制度层面分析，2008 年台湾“立法院”选举初次采用以小区单席制为主、政党比例代表制为辅的并立式两票制，其立意本在于确立对国民党和民进党有利的政党制度。但由于国、民两党得票率悬殊，民进党以 38.17% 的“区域立委”得票率和 36.9% 的政党得票率，仅分配到与其实力颇有落差的四分之一席位，在“立法院”屈居小党的地位，使民进党在同年最高领导人选举中，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从民进党的派系结构分析，“谢苏配”的形成，是民进党内各派系的妥协结果，反映了陈水扁政治操控力的下降。但由于党内派系林立和政治贪腐的“共犯结构”，民进党既不能团结一致，也无法与陈水扁明确切割以重塑清廉形象，反而在“入联公投”等激进“台独”路线的捆绑下，不断失去中间选民的支持，终于导致了台湾政党的再次轮替。

2008 年台湾的两次选举，使国民党成为掌控“立法院”四分之三席位和行政大权的执政党，随之而来的是选民要求国民党对未来的施政绩效完全负起政党政治的责任。如果说，民进党在执政初期的盛象带有相当水分的话，那么，国民党在 2008 年“立法院”选举中大获全胜，也容易导致人们低估民进党对其基本盘的控制。换句话说，目前台湾“立法院”中“一大一小”的席次格局，多少掩盖了台湾政坛“一大一中”的政党格局。面对全球经济衰退和民进党“街头路线”的挑战，国民党的当务之急就是在“拼经济”上交出亮丽的成绩。国民党在竞选期间有关“马上就好”的支票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兑现？如何评估马英九的民意支持度急剧下降对国民党未来选战的负面影响？这些都是观察台湾在第二次政党轮替后政治走向的重要指标。

### 注释：

- [ 1 ] 亨廷顿认为民主巩固并不能简单地以政党轮替的事实来推定，必须在两次政党轮替过程中都没有出现破坏民主的力量，民主的巩固才得以完成。见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 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年，第 319—324 页。
- [ 2 ] Kenneth Collier, Richard McKelvey, Peter Ordeshook and Kenneth Williams, “Retrospective Voting: An Experimental Study”, *Public Choice*, 1987 (Vol 53, No. 2), p. 102

- [ 3 ] 就影响选民的投票行为途径来说,包括社会学研究途径——哥伦比亚学派 (Columbia School)、社会心理学研究途径——密西根学派 (Michigan School)、经济学研究途径——理性选择理论 (rational choice)三种分析路径。就影响选民的投票取向途径来说,包括候选人取向 (candidate orientation)、议题投票取向 (issue voting)、政党认同取向 (party identification)、社会关系取向 (social relationship)四种分析路径。
- [ 4 ] 引自中国评论新闻网,2007-09-20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 [ 5 ] 《2008年国情调查》,《天下杂志》,2008年1月, No. 388, <http://www.cw.com.tw/article/index.jsp?id=33570>
- [ 6 ] 作者会议记录,2008年3月10日,台北。
- [ 7 ] 台湾学者首将“single-member district system”译成“单一选区制”,略去了“席位”,对于不熟悉这一选制的读者,“单一选区制”难免产生只有一个选区的错觉。本文使用“单席位选区制”或“小区单席位制”来指涉这一制度。
- [ 8 ] Tun-jen Cheng & Da-chi Liao, “Testing the Immune System of a Newly Born Democracy: The 2004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Taiwan”, *Taiwan Journal of Democracy*, 2006 (Vol 2, No 1), p. 96; Alan Romberg, “Cross-Strait Relations: In Search of Peace”,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No 23), p. 6, <http://media.hoover.org/documents/CLM23AR.pdf>
- [ 9 ] 在实行两票制的国家或地区,并立式的计票方式与联立式不同。并立式指的是各政党根据政党票的得票比例,分配不分区代表席位,根据小区代表得票情况,分配区域代表席次,两者互不影响,计算方式较为简单;联立式指的是以各政党在政党票的得票比例,确定各党所应得到的议席总数(包括不分区代表和区域代表)。如果某个政党所获议席总数超过了政党票的得票比例,就要扣除其不分区代表名额,补给所获议席总数低于政党票得票比例的政党。
- [ 10 ] 萧新煌:《新世纪的沉思》,台北:新自然主义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第210—211页。
- [ 11 ] 作者对原“新潮流系”人士的访谈记录,2009年6月18日,19日,台北。
- [ 12 ] 当时尚有以康宁祥为代表的“康系”和林正杰为代表的“前进系”。
- [ 13 ] 陈水扁:《关不住的声音》,台北:财团法人凯达格兰基金会,2009年,第98—102页。唯苏贞昌的“逼宫”说,在该书中未提及,只是“游系”的说法而已,苏本人从未承认有此念头。作者访谈记录,2009年11月16日,台北。
- [ 14 ] 作者对民进党党工的访谈记录,2007年2月2日,台北。
- [ 15 ] 作者对“游系”人士的访谈记录,2007年2月3日,台北。
- [ 16 ] 陈水扁:《关不住的声音》,台北:财团法人凯达格兰基金会,2009年,第118页,120页,280—281页。
- [ 17 ] 作者访谈记录,2008年3月7日。

## On the Deep Roots of Taiwan's Second Power Turnover

LIN Gang, CHU Jun-geng

**Abstract:** Taiwan's second power turnover in 2008 is fundamentally due to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DPP)'s inability of resolving the issue of political corruption and economic recession, the two issues most concerning the ordinary voters. The “three-in-one” local elections in 2005 served as a watershed, indicating the DPP's declining influence in Taiwanese politics. The January 2008 elections of Taiwan's Legislative Yuan under the single-member district electoral system supplemented by the mechanism of party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has exaggerated the gap between the Kuomintang (KMT) and the DPP in their votes during the elections, resulting an extremely asymmetric power structure in the Legislative Yuan, with the KMT accounting for three quarters of seats. During the March 2008 elections, the DPP's candidate for the supreme leadership cannot integrate the party's internal factions and reduce the negative impacts of Chen Shui-bian's scandal. Sticking to the radical line for Taiwan independence, the party failed to win support from votes in the political center, thus resulting in the second power turnover between different parties on the island.

**Keywords:** Taiwanese politics, electoral system, single-member district electoral system,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